

阿曼达·海特 著



Как вдам мое счастье
В-речица саде блаженное днее,
Ко конца ее мала расы
С опущен бегу в поднебес!
Беско мбочиу туде — речь!
Охры бояра вдохни
И вдиги и в землю, и в небо!

阿赫玛托娃传

ANNA AKHMATOVA

蒋勇敏 朱霄鹏 袁晓芳 译

东方出版中心

阿赫瑪托娃传

阿曼达·海特 著

蒋勇敏 朱霄鹏 袁晓芳 译 郑体武 校订

东方出版中心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ANNA AKHMATOVA. A Poetic Pilgrimage

Copyright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Chinese Copyright © Orient-Publishing Center, 1998

中文版权 © 东方出版中心, 1998

This translation of Anna Akhmatova. A Poetic Pilgrimag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76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cens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not for export therefrom.

本书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译出,经授权,由东方出版中心在中国独家出版发行。

阿赫玛托娃传

阿曼达·海特 著 蒋勇敏 朱霄鹏 袁晓芳 译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开本: 850×1168(毫米)1/32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6)

印张: 8.75

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字数: 210千字 插页2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版次: 1999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80627-394-8/K·49

定价: 15.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俄罗斯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的传记。

阿赫玛托娃是阿克梅派的代表诗人之一，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她的诗具有古典诗歌的优美、清晰、简练与罕见的和谐，是古典诗歌传统和俄国诗歌现代经验的有机结合。虽然阿赫玛托娃一生都以爱情作为她的创作主题，并以其强烈的、富有感染力的女性语言来表达，但并不妨碍她去观照历史。

本书是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部阿赫玛托娃传，它通过诗歌漫游的形式，生动地描述了阿赫玛托娃曲折坎坷的一生，不仅引领着读者循着诗人的生命轨迹，了解诗人复杂多蹇的命运，同时也充分认识了诗人所处的时代，从而用心灵去感知和理解其诗歌创作的内涵。

本书作者与阿赫玛托娃交谊甚厚，不仅拥有众多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能准确地运用资料，从而提出独到的见解。加之作者本人也是一位诗人，故本传记不仅内容扎实可靠，且文字优美流畅，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可读性。

中译本序

安娜·阿赫玛托娃是我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一位俄罗斯女诗人,也是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抒情诗大师,有“20世纪的萨福”之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将1989年命名为“国际阿赫玛托娃年”,以此在世界范围内隆重纪念这位大诗人的百年诞辰。

阿赫玛托娃是继俄国象征主义之后兴起的诗歌流派阿克梅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该阵营中占有特殊地位。她的诗歌是20世纪俄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她的风格是俄国诗歌的古典传统与现代经验的有机结合。她虽然不像其他阿克梅主义诗人那样,善于通过理论文章发表自己的艺术见解,但有趣的是,阿克梅主义者所鼓吹的形象的具体性、可感性、生动性,语言的质朴性,词义的清晰性和重量感,所有这一切都集中而有机地体现在了她的作品中。

阿赫玛托娃早期的几个集子《黄昏》、《念珠》和《白色的鸟群》远离阿克梅主义所谓男性的生活观,将读者引入一个封闭的、充满感伤情调的私生活世界中。她的才华使她的诗超越了阿克梅主义的狭隘“车间”。她既没有去史前时代寻找灵感,也没有到异国风情中获取题材,虽然使用的是狭窄的生活材料,却为俄国诗歌恢复了澄明世界和具体形象,不但克服了象征主义的朦胧晦涩,也克服了古米廖夫的自命不凡。勃洛克发现了这一点,把她同其他阿克梅主义诗人区别开来:“只有阿赫玛托娃……是个真正的例外;我不知道她是否认为自己是个阿克梅主义者,但无论如何,在她疲乏的、病态的、女性的和内省的风格中是找不到半点旺盛的体力和精力的。”

阿赫玛托娃的诗长期被视为“室内性”的“女性诗歌”，意思是题材狭窄，仅局限于爱情体验，远离社会生活，缺乏时代精神。然而，只要对诗人漫长的创作道路作一全面的回顾，只要将诗人晚期的《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同早期作品两相对照，我们就会立刻发现，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许多新的研究成果表明，早在《黄昏》和《念珠》中，阿赫玛托娃的诗就已经表现出历史概括意义。单纯说阿赫玛托娃的诗是“室内诗”，这是片面的。

阿赫玛托娃本人并不避讳自己的“室内性”。相反，她非常看重自己嗓音的“女性”音色，并强调说，女性诗人的主要任务是“充分表达自身和周围世界中最为隐秘的和异常单纯的东西”。爱情题材固然是世界诗歌的共同财产，但阿赫玛托娃早期诗歌对它的处理与众不同：诗人将爱情体验的难言之隐连同女性心理的全部微妙和盘托出，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用“室内性”来形容诗人的世界观时，这显然不是一个褒义词，而是诗人的精神世界仅局限于“家庭”的同义语。不过，换一个角度看，“室内性”也可以成为诗人的一座艺术大厦，一种诗歌原则，“诗歌策略”。同样的动作，发生在狭窄的空间里与发生在广阔的空间里相比，其能量只会有增无减。

问题就在这里。阿赫玛托娃早期诗歌的室内性结构是一个出色的艺术发现，它能浓缩和强化诗歌的感染力。形式主义批评家迪尼安诺夫对此有很好的理解，他在《间隔》一文中写道：“阿赫玛托娃在创作的初始阶段使人感到新鲜和宝贵的并非是她的题材，而是她对题材的‘不在乎’……使题材有意思的不是题材本身，而是处理题材并赋予题材以活力的语调，新的诗歌视角；这几乎就像一种耳语的句法，出人意外的家庭词汇是不可或缺的。她的室内风格，她生硬的家常语言是一种新现象；且诗句本身就在房间的各个角落来回走动……这当然与狭窄的题材范围和‘非重大情绪’有关。这样的题材和情绪似乎是阿赫玛托娃新的发展方向，它们将

诗人推向在她之前尚未定型且不登大雅之堂的‘叙述’和‘谈话’体裁。”

阿赫玛托娃还是八行或十二行小型抒情诗的巨匠。这种诗撷取的是主人公内心状态最富戏剧性的瞬间，在结构上类似谈话或内心独白的片段，有场景，有情节，有冲突，读来引人入胜，扣人心弦。诗人往往只用一个线索，一个暗示，便能尽现主人公的深刻感受，揭示出整个带有戏剧性的情节。

阿赫玛托娃一生坎坷，她的整个命运，尤其是后半生的身世遭际，本身就堪称一部悲壮的长诗，从中既可看出个人的荣辱浮沉，又可领略苏维埃时期半个世纪的文坛风云，发人深省。为这样一位代表性诗人立传，毫无疑问，对研究和传播阿赫玛托娃生平与创作，进而认识诗人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不可或缺的。本来，这项工作俄罗斯学者责无旁贷，不料，却让一位年轻的英国学者着了先鞭。在俄罗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真正的阿赫玛托娃研究起步很晚，俄罗斯学者至今仍未写出一部评述诗人生平与创作的系统性著作。因此，阿曼达·海特的这本书，成了第一部也是目前唯一一部阿赫玛托娃传，其意义不可低估。

海特曾留学苏联，学成后又多次访问苏联，与阿赫玛托娃私交很深，有幸得到阿赫玛托娃的“耳提面命”，应该说，写阿赫玛托娃传，她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本传记就是在她留学期间的学位论文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出版后立刻得到同行的承认和好评。

应该承认，西方学者研究俄罗斯作家，有时确实会以观点独到、视角奇特而令人耳目一新，值得我国学者乃至俄罗斯学者借鉴之处不少。然而，也不可否认，西方学者也常犯以偏概全，好走极端的错误，还不时地受到政治偏见的左右。这用不着举例说明。相形之下，海特这本书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作者不但能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还能准确地驾驭资料，条分缕析，去粗取精，从中提炼出自己独立的、令人信服的、尽可能公允的见解，加之作者本人

又是一位诗人，这既能使她以一颗诗人之心去准确地感知另一颗诗人之心，又能使她的行文变得优美流畅，轻松自然，更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相信本书的问世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最后要交待的是，书中所引部分原诗的译文除了我本人的译文外，还使用和参考了高莽、王守仁、肇明和理然等先生的译文，此处特作说明，并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郑体武

1998年6月26日于上海

目 录

中译本序	郑体武
第 1 章 1889 ~ 1914	1
第 2 章 1914 ~ 1924	51
第 3 章 1924 ~ 1941	103
第 4 章 1941 ~ 1956	159
第 5 章 1956 ~ 1966	225

第 1 章

1889 ~ 1914

我曾经狂野,冷酷,快乐,
根本不知这是幸福。

云彩映出
对马岛血腥的浪花。

1

安娜·阿赫玛托娃这样形容她出生年代的特征：“那是有着‘裙子的窸窣声’，方格毛毯，胡桃木框的镜子，长毛绒面的扶手椅和煤油灯黄色灯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的俄罗斯。”^①

阿赫玛托娃于 1889 年 6 月 11 日（旧历）^② 出生于黑海沿岸城市奥德萨近郊大喷泉。父亲安德烈·戈连科是海军工程师。安娜在六个孩子中排行第三：安德烈和茵娜比她大，伊娅、伊琳娜（丽卡）、维克多比她小。她五岁时，四岁的丽卡因患结核病夭折。丽卡当时住在姑母家，她的死讯一直瞒着孩子们，但安娜以儿童特有的敏感猜到了这个悲剧。后来她曾说，丽卡的夭折给她的整个童年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③

安娜 11 个月时，全家迁往北方：先到巴甫洛夫斯克，后迁入皇村，即今天的普希金城。普希金曾在皇村度过少年时代，而安娜也有幸徜徉于普希金曾漫步其间的大花园林荫道。她后来写道，这是个迷人的“玩具城”，宫殿、花园随处可见。它们曾毁于战火，后又重建，但风格与战前大相径庭。诗人最早的回忆与皇村有关：“……富丽堂皇、翠绿欲滴的花园，奶妈常带我去玩耍的牧场，杂色马驹驰骋的赛马场，年代久远的火车站……”每年夏天全家回到黑海边，住在赫尔松涅斯修道院附近的斯特列列兹海湾——在

① 阿·海特在书中援引美国版《安娜·阿赫玛托娃文集》，由 Т.П. 斯特鲁威和
B.A. 菲利波夫主编，慕尼黑—华盛顿，第一卷，1967 年；第二卷，1968 年。

② 公历 6 月 23 日。

③ 她另一个妹妹伊娅也于 27 岁时死于结核病。

这里安娜与大海成了好朋友。

在未来诗人的童年时代，家里总弥漫着一种怪异的气氛。显然，家里书籍甚少，仅有一本厚厚的涅克拉索夫诗集。安娜获许在假期里阅读此书。安娜的母亲对诗歌尚有兴趣，她常给孩子们朗诵涅克拉索夫和杰尔查文的诗。但不知何故，在安尼娅^①写下第一行诗前，所有的人都确信她一定会成为一个诗人。父亲戏称她为颓废派女诗人，而正是他导致她后来成为安娜·阿赫玛托娃，而非安娜·戈连科。当父亲得知安娜开始尝试写诗时——当时她年仅17岁——他要求安娜不要玷污他的姓氏。安娜答道：“我不需要你的姓氏。”她选择了一个鞑靼姓氏——金帐汗国末代国王的姓。正如她后来所说，对俄罗斯女诗人而言，这是一个奇怪的姓，但她的曾祖母姓阿赫玛托娃。而且在俄罗斯南方鞑靼人聚居的地方，她总能感觉到某种神秘、迷人的魔力。

在哀诗《往事》中，阿赫玛托娃这样描绘母亲那双清澈的眼睛：“大海般湛蓝深邃/令人过目难忘/和她罕见的姓氏，白皙的手臂/作为遗产的善良/我似乎得到过——/我残酷的生活并不需要的礼物……”阿赫玛托娃的母亲茵娜·埃拉兹莫夫娜想必是位不寻常的妇女，她并未全身心投入家庭生活。和所有戈连科家的女性一样，她患有结核病，而她与丈夫之间的关系也不能说是完美无缺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童年给阿赫玛托娃留下的回忆并不美好。

我的童年毫无快乐可言……

没有玩具熊，没有卷发，没有雀斑，
也没有善良的阿姨，没有吓人的叔叔，
甚至没有河里的小石头作友伴。

① 安娜的小名。

而我在斑斓的寂静中成长，
年轻的世纪的清凉的寂静。
人的声音对我而言并不可爱，
我能听懂的只有风的声音。

阿赫玛托娃很早就跟着比她年长的孩子们学说法语，10岁考入皇村的一所学校。几个月后安娜得了重病，昏迷了一个星期，大家都以为她没救了。但她最终还是痊愈了。有段时间她突然失去听力，医生找不到病因。后来一位专家猜测她可能得了天花，但无任何明显症状。就在那时她开始写诗，并且一直觉得她诗歌生涯的开始与这种神秘的疾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这样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剃光头发的孩子，目光严肃，有如成人。

不知这是不是书籍的缘故，反正年轻的女诗人13岁时就酷爱诗歌，并且熟知波德莱尔、魏尔伦和“该死的诗人们”的法文诗。但称她为“书虫”未必恰当，因为她觉得自己在水里比在陆地上更为自在，她常常赤着脚，仅披一件外衣，掩上衣襟，使之遮住衣服靠大腿处的一个破洞，然后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跳进大海。有一次姑母为此劝她说，如果她是安娜的母亲，她肯定会整天哭，而安娜回答道：“还好你不是我妈妈。”

当这位姑娘稍大一些时，另一位少年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狂热地爱上了她。对他而言，安娜是海之女神，是目光忧郁的美人鱼，是月亮女郎，是夏娃。^①从那时起整整10年，阿赫玛托娃在古米廖夫的生活和诗中占据了主要位置。多年以后她改变了态度，比较认真地对待诗人少年时期的预言——把自己视为一个比实际上更不幸更悲惨的人。这一观念在她的意识中逐渐变得根深蒂固。

^① 《尼·古米廖夫选集·第一卷》，第38、29、105页（共二卷，华盛顿，第一卷，1962年，第二卷，1964年）。

1903年圣诞前夕，两位少年诗人初次相逢。^①安娜与女友瓦列里娅·秋利帕诺娃（即斯列兹涅夫斯卡娅夫人）一同前往购买圣诞树装饰品。瓦列里娅一家与安娜同住一幢楼。瓦列里娅住底楼，她是阿赫玛托娃一生的挚友。安娜、瓦列里娅和她哥哥谢廖沙与古米廖夫兄弟在中心商场不期而遇。瓦列里娅与他们相识，他们曾师从同一音乐教师。于是四人同行：瓦列里娅与哥哥米佳结伴，安尼娅则与弟弟科利亚结伴。后来古米廖夫兄弟把两位姑娘送回家。如果说这次邂逅并没给安娜留下特别印象的话，那么对古米廖夫而言，事情则并非如此。此后瓦列里娅慢慢发觉，每当安娜快放学回家时，科利亚就会出现在她们家周围，希望与安娜的哥哥安德烈认识，以期进入戈连科家极为封闭的生活圈子。

科利亚·古米廖夫是一位行动笨拙的青年，他比安娜大三岁，略带高傲的神色掩藏了内心的自卑。他博览群书，很早即开始写诗。那时他狂热地崇拜法国象征派作家。在诗中他把自己描绘成征服者，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也不喜退让。安尼娅则出落成了个子高挑的大姑娘，满头浓密的黑发如瀑布直泻，白皙的双臂细嫩修长，略显苍白的脸上有一双灰色的眼睛。在皇村幽静的池塘边，她是美人鱼，是女神。古米廖夫被安娜迷人的形象所吸引，不仅在诗中如此称呼她，还请一位朋友画了一幅“海中美人鱼”挂家中墙上。

1915年评论家A.吉泽季发表文章评论阿赫玛托娃的早期创

① 这里参考的瓦列里娅·斯列兹涅夫斯卡娅对这次会面的叙述是指在1902年。阿赫玛托娃则称她于1903年与古米廖夫相逢。在阿赫玛托娃去世后出版的，收于《阿赫玛托娃回忆录》中的常常自相矛盾的传记中，她指出是在1903年2月24日。

《达夫尼斯与赫洛亚》是瓦·斯列兹涅夫斯卡娅对古米廖夫和阿赫玛托娃的回忆录。阿赫玛托娃请瓦·斯列兹涅夫斯卡娅写此回忆录，以对当时（1964）流行于西方的关于阿赫玛托娃与古米廖夫之间关系的传言进行辟谣。1964年斯列兹涅夫斯卡娅去世前这本回忆录还未出版。目前不知这部手稿的去向。

（这部回忆录现已在《星》1989年第6期，第141~144页上发表。）

作。他注意到，阿赫玛托娃笔下的形象已由 1913 年在长诗《在海边》中信奉多神教的少女转变为基督教徒。1914 年 7 月她双手掩面，向上帝虔诚祷告，接受她的生命作为祭品以带走战争的威胁。此后 A. 吉泽季在解释诗人失去生命中曾有的多神教的喜悦时，认为这种喜悦已与诗人融为一体。^① 而事实确实如此。她刚上学那年大病初愈后所写的诗歌完全是由于接触到日常生活之外的世界而诞生的。

天真无邪的童年生活在 1905 年猝然中断。一月事件与俄国海军在对马岛之战的全军覆没，用她的话说，震撼了她一生，而且特别可怕，因为这是第一次。在与海军休戚相关的阿赫玛托娃家中，这个荒谬的惨剧带来的影响更为严重。随后，古米廖夫因为阿赫玛托娃不愿认真地对待他的爱而陷入绝望，在复活节那天企图自杀。阿赫玛托娃对此感到震惊和恐惧，她与古米廖夫大吵一场，两人从此不再见面。

而早在那年夏天，戈连科一家就解体了：父亲退休后打算定居彼得堡，母亲则带着孩子们南下叶夫帕托里亚。现在她才感到经济窘迫。而 1905 年发生的上述事件并未很快传到位于外省的叶夫帕托里亚。

由于中学还未毕业，阿赫玛托娃不得不整个冬天都跟着家庭教师复习功课，准备中学最后一年的入学考试。学习的压力有所缓解，因为年轻的家庭教师爱上了自己的女学生并因此花了两倍的时间给她上课。而 16 岁的安娜并没有以死读书来度过整个冬天，她还有一个重要的爱好——写诗。

就在这年，阿赫玛托娃对死亡的意义有了些微的理解：从个人角度——通过古米廖夫的企图自杀；从更广泛的历史范围——通过对马岛惨剧，还有“笼罩着整个童年的阴影”也从意识深处钻了

^① A. 吉泽季《三个灵魂》，《月刊》1915 年第 12 期，第 154~160 页。

出来。在 70 岁时所写的对莫季里亚尼的回忆中，阿赫玛托娃说道，未来“在进门之前长久地投下影子，而后敲打窗户，隐身于灯笼之后，穿过梦境……”直到 1955 年，在走完生命的大半路程之后，阿赫玛托娃才明白自己童年的特殊性，并将此写成诗：

从一开始我就仿佛
是别人的梦境或呓语，
或别人镜中的影子，
没有理由，没有名字，没有躯体。
我已明了我注定
要犯下的种种罪行。
我踏着梦游般的脚步，
进入生活，恫吓生活：
它在我面前草地般展开，
普罗塞尔皮那曾在这里散步，
在无亲无故，毫无所长的我面前，
一扇门突然打开，
跑出一群人，高喊：
“她走出来了，她自己走出来了！”
我惊讶地看着他们
心想：“他们疯了！”
他们越是对我倍加称赞，
人们越是对我赞不绝口，
我越害怕生活在这世上，
越想从梦中醒来，
我知道我要付出百倍的代价，
在监狱里，在坟墓里，在疯人院里，
在一切与我相似的人应该醒来的